

研究論文

## 地方媒介體系：一種都市抗爭的政治資源

曾繁旭  
黃廣生

### 摘要

在以往媒體和社會運動關係的研究中，鮮有將地方媒介體系作為分析單元，因此無法解釋不同地方的媒介體系在當地社會運動中表現的落差，更無法揭示地方媒介體系與社會運動目標達成之間的關聯。本文以中國都市維權事件為例，從社會網路的理論視角出發，對地方媒介體系中出現的特殊新聞生產機制進行帶有理論指向的描述。它揭示出地方媒介體系在本地、國內和國際三個輿論場為社會運動提供支援的動態運作過程。本研究認為，一個相對成熟的地方媒介體系，往往可能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與行政權力進行談判和協商的新聞生產機制，策略地運用本地、國內和國際三個輿論場，從而弱化行政權力對地方媒體的行政管治，為本地的社會運動拓展輿論空間。形構中的地方媒介體系，往往分享一套有別於主流宣傳部門的專業操作規範、理念和文化，並且透過各種媒體人的關係網絡得到反覆強化，可能促

曾繁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媒體與公民社會、環境傳播、社交媒體與民眾輿論。電郵：zengfanxu@gmail.com

黃廣生，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研究生。研究興趣：環境傳播、政治傳播。電郵：hguangsh@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2年2月6日。論文接受日期：2012年5月14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4期(2013)

進媒體行業內部自治的發展。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媒體公共性成長的一個重要邏輯。

關鍵詞：地方媒介體系、社會運動、媒體人社會網路、輿論場

## **Exploring Local Media Systems in China: An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for Urban Contention**

Fanxu ZENG

Guangsheng HUANG

---

### **Abstract**

In China, the media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formed different local media systems sharing different media cultures and news operation standards. These local media systems have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for urban contention and have shaped the latter. Previous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social protests ignore the local media system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Using case studies, conten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draws upon the theory of social network to describe the special news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Guangzhou during urban conten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a well-developed local media system, different local media organizations share similar media cultures and news operation standards, which urge them to compete with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o actively mobilize their social connections with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journalists nationwide and worldwide to report on the local protests. By doing so, the local media system

---

Fanxu ZE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and civil societ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Guangsheng HUANG (Master Candidat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s successfully made local urban contention a hot issue in the different arenas of public opinion including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us avoid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opaganda censorship. One argument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local media systems have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for urban contention in China, which influences the outcomes of urban contention. Also,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urban contention, the local media systems enhance their publicness and autonomy from local control.

**Keywords:** local media system, urban contention, journalist network, arenas of public opin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eng, F. X. & Huang, G. S. (2013). Exploring local media systems in China: An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for urban conten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 119–154.

## 地方媒介體系與都市維權運動

從1990年代開始，各種都市維權運動就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多個城市爆發。其中多是鄰避運動(丘昌泰，2002；何豔玲，2009)性質。<sup>1</sup>近年來，隨著各種可能帶來環境風險的大型工程快速推進，都市居民們也越來越多因此發起抗爭運動，比如廈門海滄區業主反對PX項目、上海社區業主反對磁懸浮列車工程等都屬此列。<sup>2</sup>

由於鄰避運動的性質，「都市維權運動」通常在某一個城市展開，它們的發展很大程度受到地方媒介體系的影響。我們時常看到這種落差：在一個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中，業主行動能得到更多的媒體曝光，並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甚至有時改變了公共專案和公共政策的安排。而在地方媒介體系落後的地方，則可能是振臂疾呼卻應者寥寥。從中國都市維權運動(Urban Movement)的脈絡中對地方媒介體系加以考察，我們發現了地方媒介體系的差異對都市維權運動結果的影響。

比如，在廣州這個媒介體系十分發達的城市，許多都市維權事件都得到了媒體的大量關注。從房地產開發商毆打業主的維權個案，到業委會選舉的制度性議題，再到業主環境維權運動，廣州本地媒介體系從未缺席。<sup>3</sup>此外，這個高度發達的媒介體系不僅關注本地議題，也關注其他全國性的都市維權議題。比如在廈門業主反對PX專案、成都彭州石化專案等議題中，在事件當地媒體集體噤聲的情況下，廣州的媒體卻給予了大量的報道。

在本研究當中，我們將地方媒介體系定義為，以核心城市為基本單元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徵的媒介環境。它通常是一個多家媒體共存並相互競爭的局面。經過近20年的媒體市場化改革，若干核心城市的地方媒介體系已經逐漸發展出自己的風格，在獨特的政治經濟結構下，各個地方媒介體系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聞生產運作特徵。尤其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南京、鄭州等更是如此。在一個地方媒介體系之中，市場競爭程度、行政管理模式、消費者結構都較為穩定，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個媒介體系的運作特徵；而地方的媒體人，往往也認定其他當地媒體為競爭對手，在專業表現上相互「競爭」

或「學習」，這促使他們逐漸形成一個專業網路並分享相近的專業理念。

本文要重點考察的正是，地方媒介體系對於都市維權運動的影響。具體而言，本文關心的是在獨特的政經結構下，地方媒介體系如何影響媒體對於都市維權運動的新聞生產機制？在一個高度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當中，媒體如何能動運用本地、國內和國際三個輿論場而拓展輿論空間，為地方的都市運動塑造輿論？進一步而言，地方媒介體系又對都市維權運動的結果產生何種影響？

本研究發現，一個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中，地方媒體人通常會在關於公共議題的新聞生產中發揮能動作用。在中國特殊的新聞體制下，地方宣傳部門的監管常常使地方媒介體系噤聲，這成為本地媒介體系推動當地社會運動議題的主要障礙。而一個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往往形成較強大的專業理念，善用專業網路，充分利用地方、國家和國際三個輿論場的角度，形成全國和國際的輿論共鳴景觀，對當地行政部門形成壓力，促進政策的調整。地方媒介體系能否積極發揮能動性，往往導致都市維權運動結果的不同。

## 地方媒介體系作為研究變數

事實上，學者們(何豔玲，2005；陳映芳，2006；孫瑋，2007；Mertha, 2008；曾繁旭，2009；Yang, 2009；Cai, 2010)的研究已經表明，中國新興的都市維權運動總是與大眾媒體的報道相關聯。這些學者傾向於認為，媒體的輿論塑造在社會運動的問題化、動員、推動問題解決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大眾媒體有助於增強抗爭行為的合法性，並將其「公共化」，從而擴大抗爭的影響力，推動問題的解決。

很多研究從社會學或是政治學的視角出發，強調媒體作為中國都市維權運動的重要抗爭資源的潛力。但是並沒以媒體為核心考察對象展開細緻研究。而相反，在傳播研究的領域，目前關注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研究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它們大部分都缺乏比較的視野，未能看到不同地方的媒介體系在推動本地社會運動議題中表現的差異。由於缺乏對此的重視，學者們並未能將地方媒介體系作為一個變數納入分析範圍。因此，目前的研究無法解釋：為何在某些地方媒介

體系下，社會運動得到的關注更多，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媒介體系中則相反；也無法具體論述各地的大眾媒體如何再現和塑造新興的都市維權運動，如何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賦權於都市民眾。因此，也就無法進一步梳理傳統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機制，以及它們彼此結緣的邏輯。

其次，在分析媒體對社會運動的作用時，學者們傾向於將分析單元局限於媒體機構，強調不同媒介機構自身的形態差異導致了對社會運動議題報道的差異。比如專業主義導向媒體、市場導向媒體、行政導向媒體等（曾繁旭，2009；李豔紅，2006）。然而，本文要強調的是，單個媒介機構之間的差別固然重要，但區域化的媒介體系更為值得關注。在我們看來，各個地方媒介媒體之間的差異，導致了各地媒體在專業理念和新聞實踐上的南轅北轍。

再次，全球化時代輿論環境日趨複雜，一場社會運動往往受到國際、國內和本地三個輿論場的影響，這被既有的研究忽略。在以往的為數不多的個案研究中，由於沒有將地方媒介體系作為分析的單元，在考察媒體對社會運動議題呈現和輿論塑造時，未能分析地方、全國和國際三大輿論場對地方社會運動的不同作用。而且，這些研究多為靜態資料分析，缺乏參與式觀察，難以還原地方媒體如何推動地方社會運動議題在地方輿論、全國輿論甚至國際輿論這三個輿論場中擴散和流動的動態過程。更無法觀察到在社會運動中，地方媒體在地方管制和國家管制這兩個層級之間的複雜運作過程。因而也就無法理解地方媒介體系在這一關鍵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基於此，我們把地方媒介體系當作一個重要的變數，並且認為，地方媒介體系是中國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機會要素，它的差異將導致了社會運動者的抗爭方式和結果的變化。

當然，之前關於中國傳媒改革的研究也曾注意到地方媒介體系的作用，但卻只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停留在地方媒介體系的政經結構的分析，指涉內容主要是媒介的市場競爭、政府管制和媒體空間的關係。比如，有學者用「黨國——市場法團主義」這一概念來概括在獨特政經脈絡下的中國傳媒。並將「黨國——市場法團主義」區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以上海和深圳媒體為代表的依附庇護型

(Clientelism)，由於政府層級的單一，傳媒可以直接受管控，傳媒空間較小；以北京為代表的各政府層級多元平衡格局下的多元管理；而廣州媒體則在黨國意識形態限制和市場競爭之間爭取媒介空間 (Lee, He, Huang, 2007)。

總體而言，以往的學者常以市場競爭程度和政府層級空間等宏觀政經結構來討論地方媒介體系。但如果我們的考察只停留在宏觀政經結構的分析，則難以解釋這樣一個宏觀的政經結構如何影響了媒體和社會運動的互動關係。在本文中，我們將從新聞生產過程和機制的角度出發，運用社會網路的相關理論概念，對地方媒介體系展開考察。在我們的研究中，地方媒介體系是動態和微觀的。

因此，我們的研究將有別於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以廣州這座媒介體系高度發達的城市為標本，以廣州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這個都市抗爭議題為案例，探討在一個轉型國家之中地方媒介體系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我們將重點觀察宏觀政經架構下地方媒介體系在社會運動中的能動作用，其對於在地社會運動的報道偏向，並考察其與全國輿論場和國際輿論場的互動機制，以更好解釋地方媒介體系和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

## 個案選擇與研究策略：廣州地方媒介體系

作為南中國的媒體重鎮，廣州的媒介體系是中國媒介市場化改革眾多標本之一。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經結構，廣州媒介體系在中國市場化的歷史進程中引領風氣之先。1996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率先成立，首開風氣，掀起了90年代中期以來的媒介集團化浪潮。1998年，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和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相繼成立，形成了廣州報業的「三足鼎立」之勢。

由於「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雙重屬性，各大集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黨營輿論公司」(何舟，1998)，必須扮演「黨的喉舌」角色。所以，各大集團旗下都擁有《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充當「黨的傳聲筒」的報紙。此外，為了拓展市場收入，各大集團旗下又出現了一批以市場為導向的都市類報紙，比如《南方都市報》、《新快



報》、《資訊時報》等。這批市場導向的都市類報紙，以「讀者為中心」為專業理念，相互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

學者們認為，廣州處於強市場競爭的媒介格局，資本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其與政府的關係；而且由於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給媒體提供了較大的空間 (Lee, He, Huang, 2007)。有的學者將其稱為「高度媒體市民社會」(黃煜、曾繁旭, 2011)。這描述出廣州媒介體系與體制之間的距離。

在我們的觀察中，廣州媒介體系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具有鮮明特徵的新聞理念和新聞操作規範。這一獨特新聞理念，並不完全符合西方所謂的新聞專業主義，並非簡單地抱持客觀、全面和中立的理念，而是體現為切合當下中國語境的某種社會關懷。這影響了新聞生產的每一個環節。<sup>4</sup>

而且，廣州本地媒體與全國其他媒體和國際媒體有著眾多的交流和合作。這使得廣州的媒介體系保持開放的姿態，與全國和國際輿論場有著眾多的互動，形成開放的新聞生產機制。

作為「南中國的新聞大學」，廣州地方媒介體系聚集和培養了大量懷有新聞理想的傳媒人。並隨著職業的變遷，將南中國的新聞理念播撒到全國各地。藕斷絲連，昔日同事變成今日同行，但新聞的價值理念和私人情感將彼此連結起來。以南方為核心，一張大網撒向中國版圖的各個角落。

之後，隨著社交媒體在中國的異軍突起，比如博客、牛博網、開心網、飯否、Twitter，新浪微博等，廣州媒體人職業網路又得以向虛擬空間拓展，通過虛擬社群與外地志同道合者建立聯繫，加深交流互動。

因此，從孫志剛案件，到最牛釘子戶，再到華南虎事件；等等。一系列公共事件都在廣州這個高度發達的媒介體系中發酵並引爆了全國、甚至國際社會的輿論關注。在2007年後多次公共性事件中，這一地方媒介體系獨特的新聞生產運作機制漸趨成型。

下文將以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為例，觀察廣州媒介體系與都市維權運動的互動過程。由於這是一個發生於廣州當地的都市維權抗爭事件，在地方媒介體系當中持續震盪，因而能夠透視出廣州媒介體系的新聞生產運作特徵。通過運用內容分析和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下文將

具體闡述)，我們深描了廣州媒介體系對地方社會運動產生的影響。

2009年3月，廣州番禺區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事件開始見諸於廣州本地的都市媒體，之後，該事件逐漸發展成為地方媒介體系中的熱點議題(Hot Issue)，各種相關的報道和評論密集出現。2009年12月20日，番禺區書記明確表示，番禺垃圾焚燒廠專案將不在原有位置上建設。一場都市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的維權抗爭，經過近半年的線下行動和媒體關注，有了階段性的結果。

那麼，在廣州這個高度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中，媒體如何報道並推動社會運動？在其中，傳統媒體人有何特殊的報道策略和生產機制，以跟進、報道一個爭議性的議題，並且在行政干預之下找到「空間」？地方媒介體系如何充分利用地方、國家和國際三個輿論場的角力，推動社會運動議題的發展？進一步說，特殊的地方媒介體系對於這場熱烈的都市運動產生了什麼影響？

國外關於社會抗爭與媒體的相關研究一再證明，新聞記者在將新聞事件轉化為媒體內容時，常常帶著自己的偏向，這也表現在記者的「訊息源引用」和「框架使用」的方式上(Tuchman, 1978; Hall, 1982; Van Zoonen, 1992；轉引自翁秀琪，1997)。為瞭解在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燒廠事件中，地方媒介體系如何通過對事件的「再現」與「塑造」，從而促進在地社會運動的過程，我們選取了與事件高潮點(業主們2009年11月23日前往廣州城管委「上訪」)相接近的3個月份，即2009年9月23日至2009年12月23日，對廣州兩份主要的都市報紙《南方都市報》和《新快報》的報道進行內容分析。<sup>5</sup>這個時間段，覆蓋了事件高潮期中的諸多重要節點，<sup>6</sup>因此也充分體現了媒體的報道傾向。

在選定的時間段中，我們採用了完全抽樣的方法，逐日對兩份報紙的相關報道進行檢閱。我們的分析類目包括：報道的頻次、訊息源特徵、報道主題、報道立場等。由於一篇報道往往包含了多個訊息源，甚至多個報道主題，因此我們採用了重複統計的方式。

與此同時，為了深描地方媒介體系中的新聞生產運作機制，以及地方媒介體系如何在本地都市運動中發揮本地、全國和國際三個輿論場的輿論塑造作用，我們借用社會網路的相關理論概念對這一機制進行帶有理論指向的描述，並進入媒體的新聞生產部門進行記錄和訪

談，嘗試還原新聞生產的過程。由於我們發現廣州媒介體系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又與全國乃至國際輿論場發生互動，所以我們選擇採訪廣州本地媒介體系中負責這一議題的新聞工作者，既瞭解他們的新聞生產流程以及策略，也重點考察他們如何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路聯動全國媒體以及境外媒體。具體而言，我們訪談了四位最活躍參與該議題的廣州媒體人，包括《南方都市報》負責該議題的一位新聞編輯和一位評論員；《新快報》負責該議題的一位記者；《南方週末》的一位評論員。訪談時間集中於事件的高潮期前後（以2009年11月23日業主集體上訪事件為時間節點），詳見下表。

表二：本文的訪談資料說明

| 受訪者 | 服務單位或職業 | 訪談方式 | 訪問日期        | 訪問地點 |
|-----|---------|------|-------------|------|
| 編輯  | 南方都市報   | 面對面  | 2010年1月15日  | 廣州   |
| 評論員 | 南方都市報   | 面對面  | 2009年11月24日 | 廣州   |
| 記者  | 新快報     | 面對面  | 2010年1月20日  | 廣州   |
| 評論員 | 南方週末    | 面對面  | 2010年1月19日  | 廣州   |

對於媒體人的訪談，按照半結構化的方式進行。研究者只準備非常基本的提綱，並且盡量根據每位被訪者的情況，對於訪談提綱進行調整。每個訪談的時間大約為一個半小時。在被訪者同意的情況下，我們進行了錄音。

部分傳統媒體人充分利用博客、微博、論壇等新媒體平台，在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扮演了職業之外的個人參與角色，在互聯網上發表工作以外的評論或資訊。這也是本文的資料來源。我們的收集也涵蓋了2009年10月到2009年12月這段時間。另外，筆者還對地方媒介體系的新聞生產進行參與式觀察。筆者自2003年初進入廣州多家媒體實習，2004年初正式擔任廣州某新聞雜誌記者而後為資深編輯，親身見證了廣州媒介體系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筆者還曾擔任該新聞雜誌駐北京記者，對廣州媒體人與外地同行、外國同行的互動機制有切身體會。而在議題發生期間，筆者在某新聞雜誌參與撰寫了該議題的部分稿件；也曾參與本地媒介體系中媒體人的討論，了解他們的報道

進展和策略。

概括而言，本研究涉及兩種研究方法，前者為量化的內容分析，主要想回應的是，廣州媒介體系如何報道並推進該議題；後者為質化的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旨在還原地方媒介體系的新聞生產的過程，並且探究其與全國輿論場和國際輿論場的互動機制，以更好解釋地方媒介體系和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下文分別從量化和質化兩個路徑展開討論。

## 廣州媒介體系如何推動都市維權運動

廣州有《廣州日報》、《羊城晚報》、《南方日報》、《資訊時報》、《新快報》和《南方都市報》等多份報紙，形成了激烈的市場競爭。市場導向的都市類媒體具有強烈的經營自覺，最有受眾意識。比如《資訊時報》、《新快報》和《南方都市報》等。《南方日報》、《羊城晚報》機關報或「傳統黨報」，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足，近年來也積極轉型，更加關注民生。

在番禺議題中，我們選擇了《南方都市報》和《新快報》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因為《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傳統地方報紙雖然積極轉型，但畢竟受到較多的約束，民間立場並非最突出。《廣州日報》是廣州市委機關報，受到當地行政機關關係甚密，在此類都市維權議題中往往代表了官方的立場。所以在番禺事件中，甚至有業主在社區論壇上呼籲退訂《廣州日報》。這促成了廣州日報後期報道框架的轉換。而在《資訊時報》、《新快報》和《南方都市報》三家報紙中，《新快報》和《南方都市報》競爭最為激烈。《南方都市報》可以說是廣州都市類媒體的龍頭老大，而《新快報》則緊跟其後，大有崛起之勢。這兩家報紙是廣州都市報紙的典型。

《南方都市報》是《南方日報》旗下的一份都市報，由於其在孫志剛等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的專業表現，以及評論版面的觀點尖銳而贏得了全國性的聲譽。《新快報》則是《羊城晚報》旗下的一份子報，受制於廣州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新快報》一直發展平平，但該報紙在此次事

件中扮演了「急先鋒」角色，比之一向敢言的南都，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麼，這兩份都市類報紙，如何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表現出自己對於都市運動的支持並推動議題向前發展？

我們發現，在議題當中，地方媒介體系明顯傾向於支援都市維權抗爭，並主動充當運動的宣導者，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高度聚焦」都市運動議題

在2009年9月23日至12月23日之間，《南方都市報》與《新快報》對於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議題進行了密集的報道和評論，《南方都市報》的相關報道和評論共有88篇，《新快報》的相關報道和評論有57篇。在這個時間段中，該議題成為了兩家媒體最為熱點的報道內容，佔據了報紙大量的版面。

而且，兩報對於議題的報道和評論，往往出現在報紙頭版或者廣州本地新聞頭版的位置，更是突顯了議題的重要性。兩報關注議題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有篇幅短小的消息報道、有長篇的調查性報道，有本報評論，也有各種來自意見領袖和番禺業主的「來論」和「個論」。圖片更是經常出現（本文不統計圖片報道）。可以說，兩家報紙都「高度聚焦」於這個都市維權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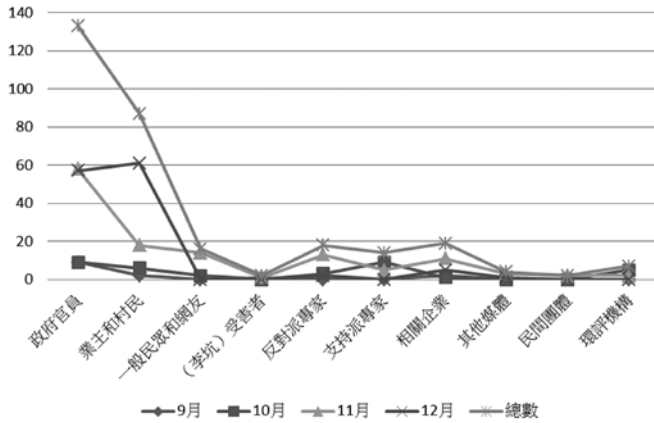
### 傾向於表達「行動者」的聲音

兩家報紙援引的消息來源十分廣泛，本文將其分類為：政府/官員，業主和村民，一般民眾/網友，(李坑)受害者，反對派專家，支持派專家、相關企業(廣日)、其他媒體、民間團體，環評機構。最終，這些訊息源也可以被歸納為兩類，一類代表了官方立場，另外一類則代表了民間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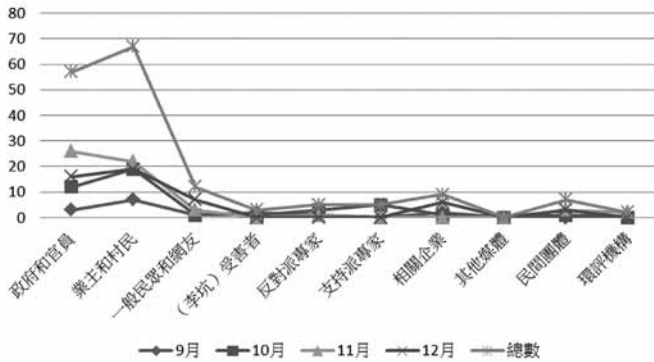
經統計發現，在《南方都市報》的相關報道中（不計算評論），共援引政府官員133次，支援派專家14次，相關企業19次；這些訊息源都屬於是官方立場的。相比之下，《南方都市報》援引的民間訊息源包

括：業主和村民87次，一般民眾和網友16次，(李坑)受害者2次，反對派專家18次，其他媒體4次，民間團體2次，環評機構7次。僅僅從數字來看，民間立場的訊息源並不明顯超過官方立場的訊息源，兩者出現的頻率可以說是相當接近的。《新快報》的報道，也出現同樣的狀況。

《南方都市報》訊息源分析



《新快報》訊息源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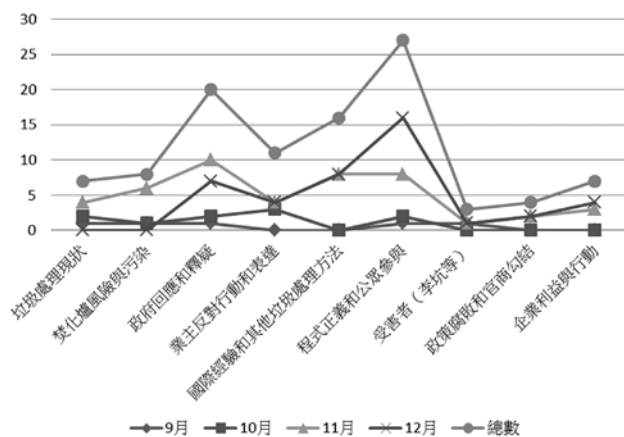
那麼，都市類報紙是如何表達維權行動者，即業主的聲音的呢？事實上，當官方訊息源出現在報道中，往往是被質問、被批評的物件，而民間訊息源則更多被呈現為理性、溫和的權利捍衛者。兩家報紙還常常扮演一種特殊的角色，就是將民間訊息源的各種批評和疑

問，直接轉給各種官方訊息源，要求其作出回應。通過這種形式，兩家都市類報紙充分表達了維權行動者的聲音。

### 強化「都市抗爭」的政策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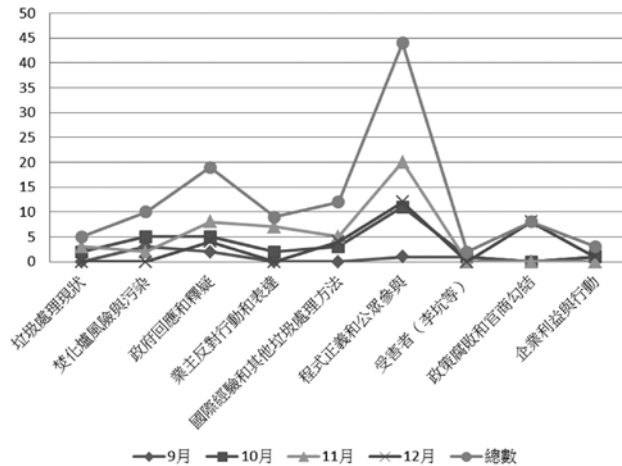
從9月到12月之間，兩份報紙對於這個「都市抗爭」事件的報道/評論主題也在變化之中，一開始集中於「垃圾處理現狀」以及「業主反對行動與表達」這些主題，而後期逐漸突顯公共政策過程中的「程式正義和公眾參與」，同時也越來越多介紹「國際經驗和其他垃圾處理方法」。在《南方都市報》的所有88篇報道和評論中，27篇主題為「程式正義和公眾參與」，數量在各類主題中所占比例最大。而在《新快報》的57篇報道中，涉及「程式正義和公眾參與」的報道數量多達44篇。這一轉變過程，實際上強化了「都市抗爭」的政策訴求，合法化了業主的抗爭行為。

《南方都市報》報導/評論主題分析





《新快報》報導/評論主題分析



相比之下，《新快報》則比《南方都市報》更旗幟鮮明強調應該加強「程式正義和公眾參與」，批評「政策腐敗與官商勾結」，但卻更少涉及「國際經驗和其他垃圾處理方法」等技術性的問題，顯示這家報紙急於強化自己與中產業主的貼近立場，但卻未能提供具體的行動指引。另外，《新快報》常常在一篇報道中涉及多個報道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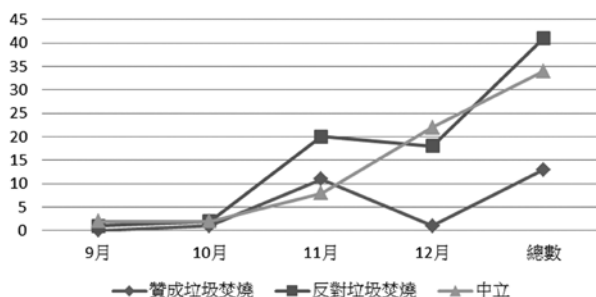
事實上，都市類媒體報道「都市抗爭」議題，一直選擇相近的主題，即最經常強調「程式正義和公眾參與」，從而表現業主等行動者的理性特徵，同時也扮演了「風險預警」的角色，介紹相關的風險因素以及國際上的相關經驗，緊密呼應業主的抗爭行動。在「廈門業主反對PX」等一系列相關的都市抗爭事件中，媒體都有此一表現。

### 鮮明的反對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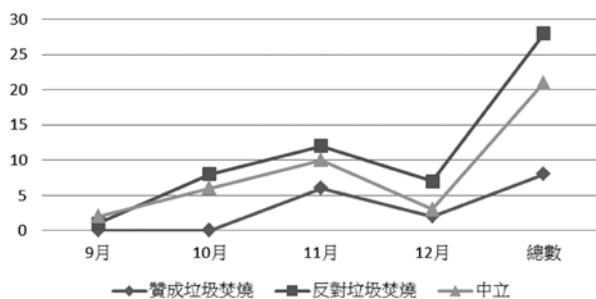
從總體上看，兩份都市報紙在報道、評論中更多採取了「反對」立場，明顯超過「贊成」立場。尤其在評論版面，兩報的「反對」聲音更為激烈。根據我們的統計資料，《南方都市報》中採取反對垃圾焚燒立場的就有41篇，《新快報》中則有28篇。



《南方都市報》報導/評論立場分析



《新快報》報導/評論立場分析



事實上，兩報的「反對」立場，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漸明晰，並越來越聚焦於焚化爐工程的負面消息，強化了對於政府和企業的批評。兩份都市報紙的反對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推動政府作出回應。這在以上的報道主題分析中有所體現——兩報在11月、12月更多出現「政府響應和釋疑」的報道主題。

### 推動政府響應

在番禺垃圾焚燒爐事件中，本地媒體對新聞的呈現方式也擁有自己的邏輯，避免報道議題和框架被官方或維權業主操控。主要體現為報道立場上對於維權行動者的偏向，以及充當政府和民眾之間互動的橋樑，促進政府框架和運動框架的整合。

比如，《南方都市報》的記者設定了四條報道思路，包括垃圾焚燒產業鏈的利益問題、李坑癌症死亡調查、環保官員與垃圾焚燒以及垃

圾圍城的出路。記者從最開始主要轉達官方聲音，到積極跟進民間反對人士的行動，最終確定了自己的邏輯觀察方向，這一思路的轉變使得媒體對事件的分析更為深入和具有邏輯性，同時也搭建了一個交流的平台，避免單方面作為政府的喉舌或成為反對者情緒宣洩的平台。

媒體在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中，一方面反映政府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將業主的最新消息呈現出來，有支援垃圾焚燒的觀點，有反對垃圾焚燒的態度，媒體將政府的意見傳達給民眾，報道與言論齊頭並進，報道反映事實，評論提供觀點，同時，媒體轉化成一個對話平台，業主會根據媒體的各個角度的報道以及評論，來調整個案維權走向一些政策宣導，最開始「不要建在我的後院」轉向「反對所有垃圾焚燒，保護綠色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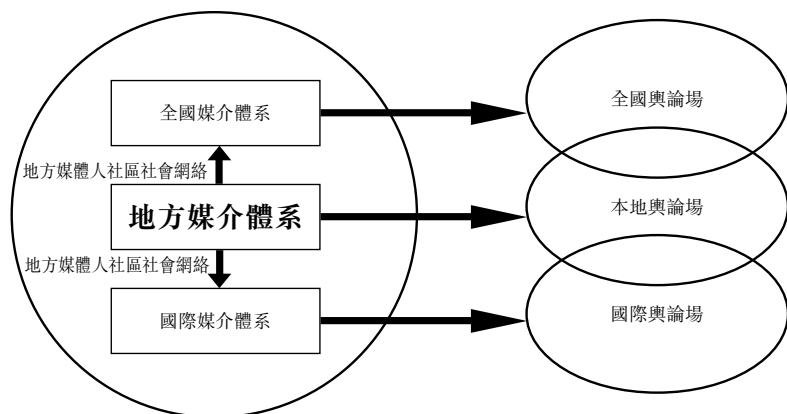
## 廣州媒介體系如何塑造本地、全國以及國際輿論場

通過以上內容分析可見，媒體在建構都市抗爭議題時，清晰地受到地方媒介體系的影響，從而表現出某種偏向。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媒體的聚光燈推動了業主的抗爭表達。記者們對於自己的專業態度有著深刻地認識，並且時常運用彈性的專業實踐方式來服務於自己的價值取向。

有人認為，是因為廣州都市媒體有大量記者居住在番禺的社區中，他們自己是環境災難的受害者，這促使他們採取了「反對專案」立場。但我們通過對於記者的深度訪談，發現在議題中表現最為活躍的記者，並不一定居住在番禺；部分居住在番禺的記者，則強調自己首先是記者，其次才是番禺業主，所以保持自身獨立性，避免偏見是第一位的。可以說，此一解釋與媒體表現的偏向，關聯度並不高。<sup>7</sup>

而通過對於媒體人的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我們發現，廣州這個高度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已經形成一套另類的新聞生產機制。首先，地方媒體媒介體系內部往往共用相近的專業理念、新聞操作方式和身份感，因此本地媒體形成了不自覺的內部分工和協作，推動議題發展，使得議題得以全面集中報道，快速公共化。換言之，地方媒介

體系中往往塑造出高度同質的本地輿論。其次，當地方媒介體系在受到行政干預時，媒體人又可能通過「稿件流動」、「提供線索，協助報道」等方式，透過植根於廣州並拓展到全國的媒體人網路，使得議題進入全國輿論場；另外，本地媒體人還通過虛擬網路開拓虛擬新輿論空間，並參與塑造國際輿論。這種特殊的新聞生產機制，為廣州媒介體系突破不同層級部門的行政干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使得「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從地方議題升級為國家議題甚至國際焦點。稿件在不同層級、不同地域、不同媒介技術平台和不同國界媒體的流動，使得議題不斷升級，形成了地方、國內和國外三個輿論場。而虛擬網路又使得議題在網路平台上獲得新輿論空間（請參見下圖）。<sup>8</sup>



### 本地媒介體系內部互動與本地輿論合力

在廣州這個高度發達的媒介體系內，媒體傾向於在專業表現上相互「競爭」或「學習」，逐漸分享相近的專業理念。這種內部互動使得廣州媒介體系形成了某種自治的力量，在政府權力控制之下達成了某種平衡，拓展了新聞實踐的空間。下文，我們將還原廣州媒介體系內部的互動機制。

我們將強調本地媒體基於理念認同基礎上的集體作戰、無意識協作和鬆散職業聯盟，但這些描述並非否認媒體人之間、媒體機構之間邊界。只是以往的研究更多著眼於新聞機構之間的差異，忽略了這些超越新聞組織邊界的互動和交流。事實上，這種頻密的內部互動對於

整個廣州媒介體系的運作至關重要，保證了整個媒介體系中對議題報道的集中用力，且報道框架和立場的基本一致，這種輿論合力的形成才能有力引導社會運動，並推動政府的響應，形成新的社會運動模式，導致傳媒宣導者角色的形成。

### 互相競爭和互相學習

《南方都市報》1997年創刊，隨後一年，《新快報》誕生，作為完全走市場化道路的報紙，它們在發行量與廣告份額兩個方面，都展開競爭。《新快報》記者在接受本文的訪談時就強調了這一點：

2009年進入《新快報》發展的一個井噴期，我們會搞一些活動，跟2008年比，2009年我們報紙的訂戶上升了4倍。今年我們在搞發行，訂一年送一年。但我們可能需要一些報道來支撐。今年是新快的第11年了，可能是到了一定程度了，到一定程度就會搞發行（競爭）。<sup>9</sup>

這種相互競爭，減少了「漏新聞」的現象，促使各大媒體全程追蹤報道，成為議題持續報道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為了追求「獨到獨家」，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各大媒體也絞盡腦汁尋找新線索，尋求新角度，使得議題不斷被推向深入。同城媒體處於相互競爭的關係中，導致了議題在整個媒介體系當中向前滾動，帶來了全方位、多角度、貼近事件進展的報道與評論。

比如《新快報》，在「番禺垃圾焚燒爐」這樣一個同題作文下，必須努力在競爭中保持「隊形」，一方面其他報紙能報的，不能漏，另一方面要去盡量尋找獨家猛料。

很多次都和南都碰車，我是很多次都會自己去的，突發奇想還能贏，一起去就是同題作文，政府召開的會議我們就會碰面，去城管委也是啊，天啊，你們這麼多人，我分身乏術啊，我跟著這個，那邊又發生事情。其實這種高度的市場競爭會導致一些結果，比如別人報了這些事情，你沒報就感覺失職了，也有點被裹挾進去，別人報了，哪怕覺得背後有點問題，覺得有點擺脫不

了。比如今天我們報道了某個事情，南都就會去跟，第二天南都出了什麼報道，我們也會去跟，我們完全是捆綁在這個事件裡面，很累，這個也是職業的一個過程，職業肯定要競爭的，作為一個士兵，也是要打仗的。捆綁的壓力也會很有意思，你領導就會跟你說，別人做了，你怎麼沒做，沒跟上，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壓力會把你捆到市場競爭上。<sup>10</sup>

新聞機構的互相競爭促成了新聞機構之間的無聲感應。基於相同的價值判斷，記者會對自己報社的表現進行評估，並思考自己接下來的報道路徑。這是一個相互學習和相互競爭的過程。

我把它看作一種戰鬥，我們報紙打戰鬥很猛，至於在策劃方面就有些欠缺，相比於南都，他們畢竟人多，所以持續性的報道就很猛，看到他們的相關報道，我們也會經常商量，應該怎麼做。<sup>11</sup>

這種相互的比較，具體到微觀的新聞生產中，還出現了採編流程中的自下而上的倒逼現象。

如果新快已經發稿了，而我們卻不敢報。我們就可以拿著報道去找報社領導，為什麼人家都報了，我們不敢報？這就可以倒逼報社領導發稿了。<sup>12</sup>

### 無意識協作

廣州作為大陸媒體較為發達的城市，同城6家日報的競爭使得對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的新聞追蹤始終不停，在市場和新聞操作的競爭之外，有意思的是，幾家屬於不同集團的報紙可能相互進行著新聞補充。當一份報紙「失語」後，另一份報紙補上。這形成了一種分擔風險的無意識的協作，避免了同城媒體集體失語的局面。這種協作空間的存在，並非新聞機構之間有意為之。根據我們的訪談，在議題發展過程中，政府一共下達了四次禁令，但媒體還是設法找到跟進議題的方式和空間。<sup>13</sup>

以「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對呂志毅事件的呈現為例，《新快報》率先報道，《南方都市報》隨後跟進。

我們先做很可能就被幹掉了，但是新快做了，所以我們需要它提前做。我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媒體能做到這樣配合。這也是在廣州，在內地、(甚至)在深圳，都沒辦法。我們都說幸虧有《新快報》。我們兩家可以你上去我下來，你下來我上去，連環衝鋒。但是在內地的話，只有一家，把那家摠住就行了。<sup>14</sup>

由競爭形成的無意識協作，使得兩家同時漏掉重大新聞點的概率大大降低了。《新快報》與《南方都市報》互相之間形成了議題滾動的模式。《新快報》最開始討論環評，並有圓桌會議式樣的評論文章，而《南方都市報》很快也有系列的評論出現；隨後呂志毅事件帶來一個高潮，《南方都市報》跟進事件，並深挖廣日集團內幕，發現了垃圾利益鏈等問題。兩家媒體，一個是突擊戰，一個是持久戰，雙方的輪番衝鋒是被裹挾的結果。但從效果來看，這是此次事件獲得階段性成果的重要原因。

隨著事態演進，同城媒體之間不斷進行議題補充，「從環評到程式，從專案本身過度至垃圾處理模式討論，從市府決策到民意表達的技術性衝突」(宋志標，2009)。這樣大規模，大範圍的報道以及評論，一方面給了政府壓力，另一方面將業主、民眾、專家等多方的討論捲入進來。這種大範圍的傳播，引起了大範圍的圍觀。

可以說，雙方無意識地協作反而將事件的真相完全還原。雙方並沒有事先商量好如何協作，但客觀上這種協作關係產生了。在此次事件中，地方的媒介體系圍繞番禺議題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 鬆散的職業聯盟

在日常的新聞工作中，迫於同行競爭和新聞群組織考核壓力，「跑口」記者擔心漏新聞，於是形成了跨機構的同行網路，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我們俗稱的「跑口」記者，由於專門長期負責某一領域的新聞報道，不僅與訊息源形成了頻密的互動，也與供職於同城其他媒體的記者形成了獨特的默契。在一般的日常動態新聞的採訪中，相互之間有著諸多的合作。比如，消息內容的互相確認和共用等等。在工作之余，這些記者彼此之間也成為了不錯的朋友。筆者的參與式觀察發

現，他們會不定期舉行記者沙龍或見面聊天，建立QQ群等，保持日常的聯繫。

而作為同一家報紙的媒體人，又分為社會新聞記者、深度新聞記者、評論員等不同角色，他們雖然關注的是同一件事情，卻往往獨立進行新聞操作，並無照會卻擁有「默契」的分工。比如社會新聞記者會尋找最新最全面的事實素材，緊貼事件的動態；深度新聞記者則會梳理事件的內在邏輯並以此進行追蹤調查；評論員則依靠提煉和回歸理性框架的方式對事件的最新動態進行分析。

根據我們的深度訪談，一開始，《新快報》主要有2個記者參與「番禺垃圾焚燒爐」事件的報道，後來事態逐漸演變，增加到5個記者。而《南方都市報》則由12個記者構成事件的報道隊伍，聲勢浩大。

由於激烈的市場競爭，這個鬆散的職業聯盟逐漸孕育出了一套彼此認同的新聞理念和評價體系。競爭壓力面前，各大媒體都將追求新聞專業主義作為自己的宣稱和品牌，記者則以寫出符合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報道為榮耀和核心競爭力。

這套職業價值觀和評價體系，落實到每個記者身上，與精神層面的業界認同和物質層面的工資報償直接掛鉤，成為同城競爭格局下媒體推動「業主抗爭議題」的微觀基礎。在這樣的氛圍下，記者們有了強烈地新聞專業自覺，積極報道該議題。因為《新快報》在番禺垃圾焚燒報道中的出色表現，記者阮劍華評為雙月一等獎，並積累2,500工分，工分是與工資績效掛鉤的。

首先可以讓這30萬人(指代番禺民眾)安心了，焦慮沒有了，那你會覺得很有成就感，畢竟看見人家笑，你也會笑；第二個就像你說的體制完善的過程，當然這個也是一個理想的看法。就說關停，30萬業主高興，民主化進程完善，會覺得有成就感，其他沒什麼。<sup>15</sup>



## 地方媒介體系與全國輿論場

透過上文，我們看到了廣州媒介體系內部在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的競爭和協作。但是，由於中國獨特的媒介體制，地方媒體同時受到中央宣傳部和地方宣傳部的控制和管理。在其中，地方媒介體系更經常會受到地方宣傳部門的管治。這成為本地媒介體系推動地方業主維權運動議題的主要障礙。在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中，媒體人往往通過自己掌握的媒體資源，和全國甚至國際媒體聯繫，並在受到行政管治和干預的情況下，主動通過將議題轉移給外地媒體，並拓展輿論空間。通過對全國甚至國際輿論場的運用，避免了地方政府「捂蓋子」。

在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除了新聞媒體內部、本地新聞媒體之間的分工與協作之外，廣州的媒體人也透過同行間的網路關係爭取更大範圍的輿論關注。他們或通過私人關係主動與外地同行取得聯繫，提供新聞線索，協助調查報道；或者直接將無法在本地媒體上發表的稿件轉投到外地，形成稿件流動的機制。通過對自身媒體資源的運用，協助報道，轉投稿件，使得議題快速升級，成為全國輿論場的熱議題，激蕩全國輿論場，並進而為本地媒體爭取話語空間。利用全國輿論場與地方輿論場展開角力，這是廣州媒介體系富有創造力的一種新聞實踐方式。

我們認為，這種新聞實踐方式獲益於一個從廣州逐漸向全國延伸的媒體人網路。事實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南方週末》的一批主力記者就相繼離開，將獨特的新聞理念帶到全國。2003年，南方日報報業集團（主要由《南方都市報》的團隊）和《光明日報》集團合辦《新京報》，相關資料顯示：「至11月11日報紙正式創刊，由《南方都市報》前往北京的共165人，其中社委7名、採編44人、廣告48人、發行45人、行政21人。一批《南方都市報》的採編、經營、發行、行政骨幹組成了《新京報》的中層團隊。而《南方都市報》北上的大旗豎起，因各種原因已離開的《南方都市報》舊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這裡面包括王小山、李列、儲璨璨、楊岸、楊彬彬等人。可以這麼說，《新京報》整個團隊基本由『南方都市報系』搭建而成」（《八年》，南方都市報編，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2004。）這一事件被戲稱為「南都北進」。當然，除



了直接的記者「遷移」，媒體人網路的拓展也由於廣州媒體（尤其南方報業集團）大規模在全國各地設立記者站，比如《南方週末》除了廣州總部以外，還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設立記者站。另外，廣州媒體較早開始拓展全國性報道的內容，很多記者常年奔走於各地，因此延伸了廣州媒體人網路，並輸出了「新聞觀念」。

### 提供線索，協助報道

根據我們的訪談，在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期間，地方宣傳部門一共下了四道禁令。在本地媒體「失語」的狀況下，尋求外地媒體的新聞報道，成為部分廣州媒體人的經驗之談。

當地媒體的失語是可以理解的，這不是什麼過錯，但是地方的媒體人不應該失語，因為地方的媒體人，你的陣地不只是你所在的媒體本身，只要是一個成功的媒體人，你一般都會有一個全國的媒體聯繫，你應該讓你的全國性媒體在這裡面起作用，你應該把這種全國性的聯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sup>16</sup>

在「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廣州媒體人運用私人關係網絡主動與外地媒體取得聯繫，隨後，外地媒體又通過廣州媒體人提供的新聞背景和線索，主動介入新聞調查。中央媒體、全國性媒體、外省地方媒體的相繼報道，使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成為11月份的全國性話題。

本來，如果開放本地媒體，可能這種討論就主要局限於本地媒體，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只是一個地方事件。但是因為本地媒體不能發聲，很快這種廣東（廣州）媒體人的私人關係，即全國性的媒體聯繫就起了作用。因為這種全國性的媒體聯繫，全國的媒體尤其中央媒體就以空前的規模介入番禺反燒。本地媒體的失語起了一個反作用，一下子引來全國媒體，升級為全國性的事件。<sup>17</sup>

廣州媒體人在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積極主動地調動自己的全國性網路，不但發出了聲音，並且使事件升級成為全國性事件。這些報道的出現突破了地方政府部門的行政干預。地方媒體人善用專業網路

形成全國輿論共鳴景觀，給廣州本地媒體在新聞實踐中的話語空間。

### 稿件流動

全國性媒體人網路的作用不僅體現在通過私人關係網絡調動全國各地媒介參與事件的報道，而且體現為媒體人稿件在全國各地媒介的流動。稿件的流動更常見於報紙評論文章和雜誌的特約稿件——評論員的文章如果在自己的媒體無法發表，那麼，通過私人關係和媒體間的關係，稿件可能在其他媒體獲得發表。

在傳統紙媒平台上，由於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稿件(主要是評論性文章)就在幾家媒體中傳遞，從一家報紙轉到別的報紙或雜誌。如《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不僅在本報上發表文章，也在《東方早報》上發，更推薦同事的評論文章上《人民日報》。

《南方都市報》的評論員劉天昭在撰寫本報社論的同時，也曾給《南方人物週刊》撰寫有關番禺垃圾焚燒廠的稿件；在給自己報社寫了《反對垃圾焚燒，宣導垃圾分類》的評論文章審核未通過後，由於《南方週末》專欄版的編輯多次約稿，劉將自己的稿子給了《南方週末》，卻依舊遭遇審核，隨後，《南方週末》的編輯將稿件轉交給北京的《新京報》，《新京報》當時認為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是廣州的本地新聞，並未發表，劉要回了自己的稿子。劉的稿件隨後又遭到香港《亞洲週刊》的忽視，經過三地四家媒體的轉移後，《反對垃圾焚燒，宣導垃圾分類》的評論文章最終又回到了廣州南方報業集團，刊載於《南方人物週刊》2009年第45期。<sup>18</sup>

稿件的流動是很正常的，比如說我們報紙(《南方都市報》)的稿子發不出來，然後編輯就會轉給《新京報》、《東方早報》等，因為編輯要盡量對作者負責，各個報紙編輯之間會有聯繫。<sup>19</sup>

或因敏感，或因輕重，劉的這篇稿件先後被四家媒體「拒絕」，但通過媒體人的私人關係和同行關係，一篇稿件在不同地區不同的媒體間進行著流動，而並未被槍斃在一個靶子上。這不僅僅是私人關係的網路，更是一張覆蓋各地各類媒體的關係網，由一定的媒體價值聯繫起來。這使得地方媒介體系可能在某個議題上塑造全國輿論場。

## 虛擬化的地方媒介體系和國際輿論場

自牛博網創辦開始，到後來的飯否、Twitter、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的出現，為志同道合的媒體人的聚合提供了新技術平台，也使得跨越時空的專業聯繫和互動成為可能。這種經由新媒體平台建立的媒體人之間的虛擬網路，再次拓展了地方媒介體系的新聞實踐邊界。這對地方社會運動議題在虛擬輿論場、全國輿論場甚至國際輿論場的擴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 虛擬網路和國際關注

在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廣州的媒體人主動通過博客等形式發表與番禺垃圾焚燒議題相關的稿件和線索，這些資料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對外地媒體的「資訊補貼」(Gandy, 1982)。其他地方媒體人獲知資訊後，感興趣的就會主動與廣州媒體人進行聯繫，尋求報道協助。

比如，劉天昭除了給所供職的報紙寫社論外，也不停地在自己的博客上更新有關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的資訊和評論。《三聯生活週刊》的科技記者袁越剛從國外回來，看到劉的博客後，開始與其聯繫瞭解更多的相關資訊。

另外，廣州的部分傳媒人還通過 Twitter、新浪微博散發消息，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其中一些屬於這個傳媒人社區並活躍於新媒體的微博主們(他們往往在以前或現在擁有體制內的媒體人身份)因為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所發的資訊，受到了外國媒體的關注，接受他們的採訪或者為他們寫稿。進而，議題進一步升級，獲得國際輿論的關注。

除了新媒體上出現的鬆散的虛擬網路，地方媒介體系也以其他路徑，比如非正式的聚會、論壇與記者沙龍等，獲得與國際輿論場互動的機會。比如，廣州媒體人北風曾持續在一家名為「凹凸」的酒吧舉辦媒體人聚會，將來自廣州各個媒體的記者以及一些國際媒體人聚集在一起，交換資訊與看法；此外，北風本人也在各種新媒體平台上與國際媒體人進行頻密的互動，將各種本地議題推廣到國際輿論場之中。

### 媒體人身份轉換與新輿論空間

除了傳統媒體的新聞操作外，一些活躍在新媒體的媒體人還積極開拓新媒體輿論空間。部分傳統媒體人充分利用博客、微博、論壇等新媒體平台，在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扮演了職業之外的個人參與角色，在互聯網上發表工作以外的評論或資訊。從2009年10月到2009年12月這段時間，針對此次事件的文章不斷在博客、微博、論壇平台發表。其中有一些已發表在傳統媒體上，更多則是未發表或無法發表的個人觀點。

《南方都市報》評論員劉天昭、記者傅劍鋒，和《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等都擁有自己的博客，除了因工作關係撰寫的稿件有可能會貼在博客上以外，因為報紙版面的有限，他們也會將更多未曾發表在傳統媒體平台的文章貼在博客上。通過互聯網的傳播力，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影響線民對事件的看法，甚至成為維權業主瞭解事件的進展以制定自己行動策略的參考。

媒體都可以用上。比如本地媒體能說話，就充分利用本地媒體，搶在第一時間說話，這是一個原則，第一時間說盡可能多的話；本地媒體不能說話，就找全國媒體；全國媒體再不行，就是網路，如Twitter，諸如此類的。<sup>20</sup>

Twitter和微博在番禺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呂志毅事件源起微博，傳統媒體隨後跟進。再比如，在11月23日，接訪日當天，北風在現場進行Twitter直播，一些媒體人也參與進來。評論員笑蜀表達對Twitter的看法：

一方面傳統媒體能用，就充分的用，如果用不上的話，就把自己變成媒體，從小空間，院落裡說到Twitter這樣大的空間裡去說。但(你)不能到了時候再去說，這樣的話，就沒有任何優勢可言。因為(在)Twitter上面，你需要有很多跟你的人，需要很多有影響力的人，有話語權的人跟你。<sup>21</sup>

## 結論與討論：地方媒介體系的影響及其前景

本文通過深描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中廣州媒介體系的表現，凸顯了地方媒介體系這一變數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角色，並將地方媒介體系中出現的特殊新聞運作機制勾勒出來。這種特殊的新聞生產機制，為廣州媒介體系突破不同層級部門的行政干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使得「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從地方議題升級為國家議題甚至國際焦點。

在我們看來，正是地方媒介體系的特徵，導致了在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本地媒體對垃圾焚燒專案持鮮明的反對立場，並「高度聚焦」於都市抗爭議題，傾向於表達「行動者」的聲音，努力推動政府回應。與此同時，廣州媒介體系也在議題中塑造了地方、國內和國外三個輿論場，拓展了議題的空間。這一研究的理論重要性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以往的中國傳媒研究中，無論是媒介市場化還是新聞專業主義的討論，時常將全國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其實由於媒體市場結構，及其與政府關係等宏觀架構的差異，各個地方媒介體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明顯地體現在媒介體系對於社會運動議題的新聞生產機制之上。

基於此，我們將地方媒介體系作為一個分析變數。本文展現，在廣州這個媒體改革的前沿陣地，當地媒體如何推動一個敏感化的都市抗爭議題及其背後的機制。正是放在地方媒介體系這一分析單元上，我們進一步回答了究竟是什麼塑造了這個媒體格局。在我們看來，以往的政治經濟學解釋路徑 (Lee, He, Huang, 2007; Zhao, 2008) 難以還原其中細密的邏輯，而從媒體人心理、專業文化等角度的討論 (陸曄、潘忠黨, 2002) 則往往容易誇大個體傳媒人的創造性行動，忽略了媒體人之間的社區與互動網路，因此我們聚焦於地方媒介體系對新聞生產的影響。這一路徑凸顯了地方媒介體系對於都市抗爭的影響巨大，而且讓我們發現了植根於廣州媒介體系且漸趨擴張的媒體人網路的重要性。這一思考路徑在以往的研究中沒有得到重視。

而且，通過觀察地方媒介體系的運作機制，我們發現了廣州媒介體系塑造本地、全國與國際輿論場的能動性。首先，本地媒體通過集

體作戰、無意識協作和競爭學習積極介入議題，塑造了同質性的本地輿論；其次，在遭遇本地宣傳部門行政干預時，地方媒介體系則積極與全國性媒體以及國際媒體聯繫，轉換輿論空間；再次，他們也在互聯網上延伸自己的專業實踐，在不同形式的媒體之間進行身份轉換，以一種近乎「全媒體」的形式開展言論，與國際輿論場形成連接。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媒介體系一旦形成，即會影響地方媒介的行業傳統和價值理念。這是一個地方媒介體系可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

第二，我們將地方媒介體系放在都市維權運動的脈絡下來考察。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都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以及都市居民自身權利意識日益萌發，各種由於房屋品質問題、房屋拆遷、環境污染以及文化資源破壞而導致的都市維權抗爭此起彼伏。這些運動，多以都市為中心；而且由於政治環境的限制和組織資源的匱乏，中國的都市維權運動多屬於鄰避運動性質。因此，在行動中，地方的媒介體系就顯得非常重要。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地方媒介體系正與都市維權抗爭形成呼應，逐漸成為抗爭行動者進行抗爭表達以及公共參與的一個重要途徑，它不僅為抗爭提供了輿論支援，更是維權抗爭得以展開的話語平台。在發達的地方媒介體系之中，都市維權運動比較容易克服外部和內部的困境，成功表達自己的訴求。本文嘗試揭示，地方媒介體系已成為判斷和理解各地都市維權運動過程和後果的一個重要的指標。這為我們後續的都市維權抗爭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和思考角度。而通過我們的實證材料也可以看出，在與都市維權等鄰避運動議題發生互動過程中，地方媒介體系的公共性也得到了提升。我們認為這也是考察媒介公共性的一個重要路徑。

第三，本文的發現對於理解所謂的「分裂化的威權 (Fragment Authoritarianism Model)」具有重要的意義。學者們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威權統治並非是鐵板一塊，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存在著談判博弈 (Bargaining) 的空間。研究者傾向於認為，在經濟領域，這種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討價還價空間比較大，而在教育、軍隊和宣傳等領域，這種空間則比較小 (Lieberthal, 1992)。而本文則從傳媒的角度，展現了在宣傳領域這一空間的存在，並且呈現了威權統治下的能動者是如何運



用這些威權空隙，試探空間的界限，並與體制產生相互作用，推動體制做出某些策略性的調整，預示了一種能動者重塑體制的可能性。

概括而言，在番禺議題中，我們看到了廣州地方媒介體系作為最成熟媒介體系，運用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與國家力量進行談判和協商的新聞生產機制，作為一股自治性力量平衡了其與國家宣傳部門的關係，弱化了行政權力對地方媒體的行政管治，拓展了輿論空間。形構中的地方媒介體系往往分享一套有別於主流宣傳部門的專業操作規範、理念和文化，並且透過各種媒體人的關係網絡得到反復強化，可能促進媒體行業內部自治的發展。

## 註釋

- 1 鄰避運動除 Not In My Backyard (NIMBY) 之外，還有 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thing (BANANA)，Not In My Term Of Office (NIMTOO)，Not In My Bottom Line (NIMBL)，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 (LULU) 等意思。最初由 Michael O'Hare 提出。參見何豔玲 (2009)。《「中國式」鄰避衝突：基於事件的分析》。《開放時代》，第 12 期，頁 102–114。
- 2 鄰避運動的主體，通常是城市中新興的業主，但從概念上區分，業主維權運動所指涉的範圍更廣。Yongshun Cai (2005) 認為業主維權運動通常涉及三類議題：第一類關心房屋本身；第二類起因於房屋拆遷；第三類關注的是居住社區的環境問題，也即鄰避運動的內容。
- 3 比如華南新城開發商毆打業主事件，雅居樂社區業主反對高速公路建設議題，廣州民眾反對南沙石化項目，番禺垃圾焚燒爐專案；等等。
- 4 南方都市報 2009 年 11 月 8 日記者節的社論《記者：觀察者、記錄者、參與者、改造者》(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燒爐事件期間) 就很好地表達了這一套獨特的新聞理念：「它既是執政黨的喉舌，又正在逐漸學習替社會發聲；它同情民生多艱，自然難免意氣，它又清楚現實選項，還要自勉理性；它要聽從行政指令，又要履行輿論監督的職責；它要為民意代言，監督政府，甚至批評，它還要向政府諫言，並學會傾聽，學會與民溝通。」
- 5 本研究不統計圖片報道。
- 6 事件的幾個關鍵節點包括：9 月 24 日，《新快報》《資訊時報》報道番禺要建垃圾焚燒發電廠；11 月 23 日，業主集體「上訪」；12 月 10 日，廣州市政

府副秘書長呂志毅被網友「圍攻」，被懷疑家人在垃圾焚燒控股公司廣日集團任職；12月20日，番禺區委譚書記宣佈不在現在的位置建設垃圾焚燒爐。

- 7 南方都市報負責該議題記者林勁松訪談中談及此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領導也一直告誡我們，就《南方都市報》，我們不能去做情緒，不能只是做居民情緒的宣洩，我們要回歸新聞本源主義，回歸新聞本身。包括從總編到下面編委，大家都堅持這樣一個觀點。正因為南方集團有很多人住在那個地方，所以我們更要避嫌。如果我們宣洩居民情緒的話，這樣是危險的。這更是需要去克服的一個問題。」《南方都市報》最早負責該事件跟進的記者就因為自身作為深度利益相關者，而放棄了對這一選題的報道。
- 8 學者張志安(2008)在分析《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的新聞生產時，曾概括調查性記者群體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對社會資本的運用方式，指出有集體作戰、稿件轉投、同行肯定、報道協助、輿論製造五種方式。這些概括，對本研究有所啟發。
- 9 來自筆者對《新快報》報道該議題記者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2010年1月20日。
- 10 同上註。
- 11 同上註。
- 12 來自筆者對《南方都市報》評論員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2009年11月24日。
- 13 同上註。
- 14 同上註。
- 15 來自筆者對《新快報》報道該議題記者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2010年1月20日。
- 16 來自筆者對《南方週末》評論員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2010年1月19日。
- 17 同上註。
- 18 來自筆者對《南方都市報》評論員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2009年11月24日。
- 19 同上註。
- 20 來自筆者對《南方週末》評論員的訪談。訪談地點：廣州；訪談時間：2010年1月19日。
- 21 同上註。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丘昌泰 (2002)。〈從「鄰避情結」到「迎臂效應」：台灣環保抗爭的問題與出路〉。  
《政治科學論叢》，第17期，頁33-56。
- Qiu Changtai (2002). Cong "linbi qingjie" dao "yingbi xiaoying": Taiwan huanbao kangzheng de wenti yu chulu. *Zhengzhi kexue luncong*, 17, 33-56.
- 宋志標 (2010)。〈從啟蒙到社運——社論的幸與不幸〉。《南方傳媒研究》，第23期。
- Song Biaozi (2010). Cong qimeng dao sheyun—shelun de xing yu buxing. *Nanfang chuanmei yanjiu*, 23.
- 李豔紅 (2006)。〈大眾傳媒、社會表達與商議民主——兩個個案分析〉。《開放時代》，第6期，頁48-55。
- Li Yanhong (2006). Dazhong chuanmei, shehui biaoda yu shangyi—liangge gan fenxi. *Kaifang shidai*, 6, 48-55.
- 何舟 (1998)。〈從喉舌到黨營輿論公司：中共黨報的演化〉。何舟、陳懷林 (編)，《中國傳媒新論》。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
- He Zhou (1998). Cong houshe dao dangying yulun gongsi: zhonggong dangbao de yanhua. He Zhou, Chen Huailin edited, *Zhongguo chuanmei xinlun*. Hong Kong: Taipingyang shiji chuban.
- 何豔玲 (2005)。〈後單位制時期街區集體抗爭的產生及其邏輯——對一次街區集體抗爭事件的實證分析〉。《公共管理學報》，第3期，頁36-41。
- He Yanling (2005). Hou danweizhi shiqi jiequ jiti kangzheng de chansheng jiqi luoji—dui yici jiequ jiti kangzheng shijian de shizheng fenxi. *Gonggong guanli xubao*, 3, 36-41.
- 何豔玲 (2009)。〈「中國式」鄰避衝突：基於事件的分析〉。《開放時代》，第12期，頁102-114。
- He Yanling (2009). Zhongguoshi linbi chongtu: jiyu shijian de fenxi. *Kaifang shidai*, 12, 102-114.
- 孟偉 (2005)。〈建構公民政治：業主集體行動策略及其邏輯〉。《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
- Meng Wei (2005). Jianguo gongmin zhengzhi: yezhu jiti xingdong celue jiqi luoji. *Huangzhong shifan daxue xuebao*, 3.
- 孫瑋 (2007)。〈我們是誰：大眾媒介對新社會運動的集體認同感建構〉。《新聞大學》，第3期，頁140-148。

- Sun Wei (2007). Women shi shui: dazhong meijie dui xin shehui yundong de jiti rentinggan jiangou. *Xinwen daxue*, 3, 140-148.
- 翁秀琪(1997)。《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台北：三民書局。
- Weng Xiuqi (1997). *Xinwen yu shehui zhenshi jiangou: dazhong meiti, guangfang xiaoxi lai yuan, yu shehui yundong de sanjiao guanxi*. Taipei: Sanmin shuju.
- 陳映芳(2006)。〈行動力與制度限制：都市運動中的中產階層〉。《社會學研究》，第4期，頁1-20。
- Chen Yingfang (2006). Xingdongli yu zhidu xianzhi: dushi yundong zhong de zhongchan jiecheng. *Shehuixue yanjiu*, 4, 1-20.
- 陸曄、潘忠黨(2002)。〈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第71期，頁17-59。
- Lu Ye, Pan Zhongdang (2002). Chengming de xiangxiang: zhongguo shehui zhuanxing guocheng zhong xinwen congyezhe de zhuan ye zhuyi huayu jiangou. *Xinwenxue yanjiu*, 71, 17-59.
- 曾繁旭(2009)。〈形成中的媒體市民社會：草根聲音如何影響政策議程〉。《新聞學研究》，第100期，頁187-220。
- Zeng Fanxu (2009). Xingcheng zhong de meiti shimin shehui: caogen shengyin ruhe yingxiang zhengce yicheng. *Xinwenxue yanjiu*, 100, 187-220.
- 張志安(2008)。〈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的張力呈現——對《南方都市報》深度報導的個案分析〉。《新聞與傳播評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Zhang Zhi'an (2008). Xinwen shengchan yu shehui kongzhi de zhangli chengxian —— dui nanfang dushi bao shendu baodao de ge'an fenxi. *Xinwen yu chuanbo pinglun*. Wuhan: Wuhan daxue chubanshe.
- 黃煜、曾繁旭(2011)。〈從以鄰為壑到政策宣導：中國媒體與社會抗爭的互激模式〉。《新聞學研究》，第109期，頁167-200。
- Huang Yu, Zeng Fanxu (2011). Cong yilinweijian dao zhengce xuandao: zhongguo meiti yu shehui kangzheng de huji moshi. *Xinwenxue yanjiu*, 109, 167-200.
- 潘忠黨(2008)。〈傳媒的公共性與中國傳媒改革的再起步〉。《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六期，頁1-16。
- Pan Zhongdang (2008). Chuanmei de gonggongxing yu zhongguo chuanmei gaige de zaiqibu.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6, 1-16.
- 潘忠黨等(2008)。〈反思與展望：中國傳媒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筆談〉。《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六期，頁17-48。

Pan Zhongdang (2008). Fansi yu zhanwang: zhongguo chuanmei gaige kaifang sanshinian bit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6, 17–48.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Cai, Y. S. (2005).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45(5), 777–799.
- Cai, Y. S. (2010).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ndy, O. (1982). *Beyond agenda-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Ablex.
- Hall S.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and J. Woollacott (Ed.),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 Lieberthal KG. (1992).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s. In K.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pp. 1–3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C. C., He, Z., & Huang, Y. (2007). Party-market corporatism, clientelism, and media in Shanghai.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2(3), 21–42.
- Mertha, A. C. (2008). *China's water warriors: Citizen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Van Zoonen EA. (1992).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media: Constructing a public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4), 453–476.
- Yang, G. B.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 Z.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本文引用格式

曾繁旭、黃廣生(2013)。<〈地方媒介體系：一種都市抗爭的政治資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4期，頁119–154。

## 鳴謝

本課題得到了第四十八批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課題名稱為「城鄉一體化、流動人口與傳媒賦權」)，以及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媒體、集體行動與底層輿論的互動關係研究」(項目批准號：11YJC860058)資助，特此致謝。